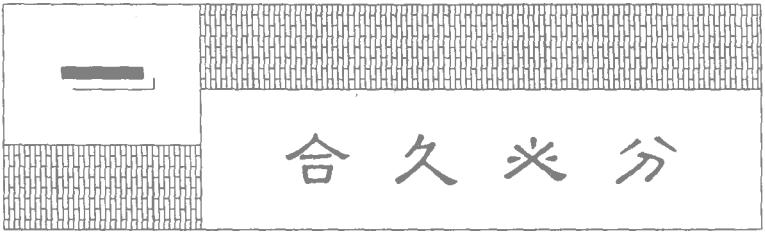


一 合久必分

西洋人谈西洋史,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或是某一文化崩溃，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汤因比（A. Toynbee)与前人不同的地方,是改用‘社会”一词,代替‘民族’或“文化”,并且补充了一点:某一社会崩溃之后,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汤因比喜欢说:“中国社会”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而只有‘远东社会”。

在实质上，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我们的周朝，十分灿烂，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我们的汉朝,十分雄伟,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国势虽有盛衰,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不曾死亡，而且继续发展。

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政府好的时候，是治;政府不好的时候,是乱。治久了以后,难免有乱;乱了一阵以后,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江山代有才人出”;由于我们这礼义之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挺身而出,做成非常之事:“拨乱反治”。于是,希腊、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而我们中国每逢‘天下大乱’以后,不久便‘形势大好”,一治一乱,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或其修订人毛宗岗,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等于说:“治久必乱,乱久必治。”这种话,西洋人说不出来。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八个字,与宇宙论中“一张一弛”的大道理,颇能相通,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合久会分,分久会合。”

至于,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而真的分了,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而真的合了?“人”的关系很大。位居要津的人,倘若有决心与能力,是可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倘若没有决心,又没有能力,那末,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

两汉的大一统局面,维持了四百多年;种种机构已经磨损、腐蚀,不再管用。分的趋势,确已形成,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剥削地方,是病征,而不是病源。

病的本身,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打外戚,除宦官,只是治标而已,治不了本。是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不是培元固本,滋阴补阳。

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减轻了赋税,因袭了秦的“三权分工”的制度,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

所谓“三权分工”,是丞相与太尉分治文武之事,御史大夫专管监察之事。这与美国的“三权分立”不同。在没有三权分立之时,这“三权分工”究竟要远优于霍光以后之权臣包揽一切了。

所谓征用全国各地人才,是下令每郡每国保送“孝廉”,由皇帝加以选拔,留在身边训练、察看,然后再分别任用为县令、县长,于任期完满以后加以升降。最好的,能被逐渐升为中央的九卿(部长)、三公(院长)。

霍光在昭帝之时,任“大司马、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是虚衔(加官),大将军在平时没有多少兵。他掌握大权,由于替皇帝“录尚书事”。尚书原是宫内的小官,在皇帝身边管文书。霍光以宫外的大官的身份“录”起皇帝的所有的文书事务来,这就成为丞相与太尉及御史大夫之上的、皇帝之下的第一人,也就是事实上的皇帝。

三权集中于一人之手,三权分工的制度,不再存在。用浅显的话来说,霍光替皇帝代阅公文,代批公文。丞相等人的奏章,虽则是写给皇帝的;事实上皇帝一概不管,都由霍光处理。

霍光以后的外戚如王莽、窦宪、邓骘、阎显、梁商、梁冀、窦武、何进,都于种种不同的加官与虚衔之下,大权独揽,宦官的领袖们,有时候大权独揽,有时候几个人合伙,作“集体领导”,如单超、具瑗等“五侯”,以及赵忠与张让等十二常侍(俗称“十常侍”)。

东汉的皇帝们,在和帝以后都是短命的人。寿命较长的桓帝,死时才三十六岁。灵帝死时,三十二岁。顺帝,三十岁。和帝自己,二十七岁。其余的,两位少帝,与质帝、冲帝、殇帝,都只是一些小孩子而已。

和、顺、桓、灵之所以短命,因为后宫的妃子太多。其他的小皇帝,有病死的,也有被毒死的,和、顺、桓、灵,留下了年轻的寡妇,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她们所能相信的,只能是自己的父亲(国丈),或哥哥、弟弟(国舅)。于是窦、邓、阎、何等几家外戚,便先后当权。

在皇太后之下的小皇帝,倘若是亲生的,则问题比较简单;倘若是“抱来的”(由别支皇族过继而来的),那就每每发生小皇帝略为长大以后,就被宦官挑拨利用,以政变的方式推倒当权的国丈或国舅,使得大权落入宦官之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央的政治机构，由于不再有三权分工，一坏便全部都坏。地方官吏之推选孝廉,成为形式,真孝真廉的人竞争不过地方官吏的私人，地方官吏自己又每每都是宦官或外戚的私人。于是现任的及未来的官吏,从上到下,极大多数成为贪污分子。老百姓只能苟延残喘于如虎如狼的贪官污吏的统治之下。

东汉在经济上，本可以比西汉略好。光武帝把王莽所不曾能够解救的奴隶，逐渐地解救了。光武帝又尽量减少贵族与大官的俸禄,尽量不卷入西域各国的纠纷,军队的开销缩小,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可以休养生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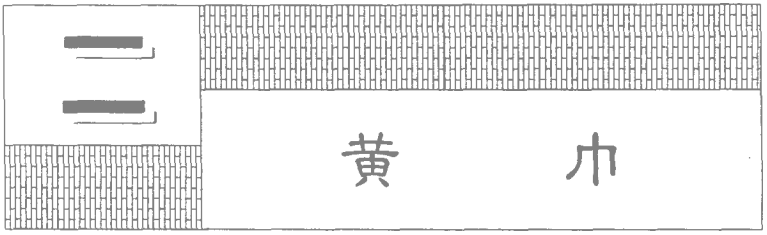
可惜，由于政治的结构出了毛病，人民在赋税方面的负担，表面上比以前少,事实上比以前多。公开的负担少,暗中的负担多。所谓暗中负担，第一是铜钱贬值。西汉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元年,一共铸造了二百八十“ 亿万 ”(所谓亿万,是十万万。二百八十亿万是二千八百万万)。东汉的铜钱流通量,于王莽末年的大乱以后,经过光武帝的整理,原已比西汉少得多。但是,和帝以后的当权之人,一方面连年打西羌、打匈奴,花钱太多;一方面又在生活上穷奢极侈,不懂得什么叫做量入为出,更不懂得什么叫做“ 平衡国家收支 ”。他们贪图铸钱的方便,用少数的铜,铸多量的钱。于是越铸越多。在顺帝的时候,中央政府一年的收入在数字上是六十万万，等于是西汉两百年所铸铜钱的总数之百分之二以上。

其他的暗中负担,是官吏的种种摊派、勒索,包括老百姓不敢不送上去的贿赂。

官吏的生活费与娱乐费,都是取之于老百姓的,却不替老百姓做事。水利的工程,让它荒废不修。黄河决口 别的河流也颇有泛滥的。大水之年以后,常常有大旱之年。水灾与旱灾,轮流地逼得老百姓没有日子过。天公又不作美。老天，不仅对人世

间贪污横行与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视若无睹，而且助纣为虐，于水灾、旱灾以外,又加了地震、地陷、蝗虫、瘟疫。

东汉末年的人民，对洛阳的中央政府失望，对老天也失望。于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的鼓动之下,人民相信老天也在生病、将死；倘若能另有一个新的老天、新的上帝来替代这生病将死的老天，该有多好！张家三兄弟告诉他们：这苍天确是生病将死，替代这苍天的，将是黄色的天。你们人民如果能在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头裹黄巾，便能于天崩地陷、宇宙换一纪元之时得救。结果，有三十六万左右的人，都加入了张家的黄巾组织。



二 黄 巾

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的失败的农民革命之一。

它的人数不为不多，组织不为不强，它之所以失败是由于领导人物之不学无术，既没有对于当前客观环境的正确了解，又没有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与理想政府的构想，更不曾聚集或培育军事的与政治的干部人才。

作为黄巾徒众之大头目的张角，及其两位弟弟张宝、张梁，懂得的只是以画符念咒、喷水治病的魔术或催眠术，用来广收信徒，借以推倒汉朝及其政府。汉朝的各级政府，何以会在安、顺、桓、灵诸帝之时坏到那种田地？要用什么样子的政府来替换这东汉末年的政府？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除了苛捐杂税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要用什么措施来铲除当时经济上的病根？这些大问题，不是张角等人所能答得出的，也不是他们所能想得出的。

他们，正如其后若干次的农民革命的领导人物（黄巢、李自成等等),只不过是对现状十分不满而凭着一时冲动“为革命而革命”“先破坏了现状再说”！从开头起，他们便不想睁开眼睛，而只肯闭着眼睛在黑暗中盲动，安得不失败呢？

计划，张角不是没有。他活动了十几年，遣派大弟子八人分

头到各地区活动，吸收了三十六万左右的徒众，以一万人为“一方”,有些方超过一万,有些方不到一万。每方,设一个“大帅”。这三十六万人，遍布于十二州之中的八州：位于今日河北省的冀州、幽州,位于今日山东省的青州、兖州,位于今日河南省及湖北省、湖南省的豫州、荆州,位于今日江苏省的扬州。

他竟然也吸收了皇帝身边的中常侍封谞与徐奉二人。这二人加入了他的组织，愿作内应。

他预定在甲子年光始七年（中平元年，公元 184 年）三月初五日，在全国各地同时起事。徒众一概以头裹黄巾为号。

这起事日期，由于有一个姓唐名周的叛徒向汉朝政府告密，不得不提前在二月某日举行。唐周的告密，使得张角一位负责洛阳地区的大帅马元义被捕，受车裂之刑；也使得宫内宫外有一千多名徒众被捕、被杀。否则，洛阳可能在三月初五日一夜之间被马元义率领的这一支黄巾军占领。

这边，在洛阳的汉朝政府立即行文到各州各郡，尽量捉拿张角及其所有徒众；那一边，张角也十分紧张，在暗中通知各地徒众,同时举动。

举动的一天，张角在他的家乡冀州巨鹿郡，自称“天公将军”,叫弟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郡的郡城，不是今日河北省的巨鹿县，而是在巨鹿县西北很远，今日宁晋县西南的地方。范晔《后汉书》与司马光《资治通鉴》,均说张宝是老二,张梁是老三。司马彪《九州春秋》与袁宏《后汉纪》,以为张宝是老三，张梁是老二）。

张角的黄巾徒众，到处攻村庄，攻市镇，遇到衙门就烧。汉朝的地方官吏敢抵抗他们的很少。原因是：他们人多。不到十天,就“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在南阳响应他的一位黄巾头目，是张曼成。在河北蠡县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南博陵的，是张牛角。张牛角战死以后，由褚飞燕继为头目，褚飞燕改姓名为张燕，不久便把部队增加到一百万人左右。此外，各地的重要分子有李大目、张丈八、陶平汉、雷公、白雀、波才，等等。

洛阳的汉朝政府，派三个中郎将到冀州、豫州，分别讨伐张角及波才等人。派往冀州的，是“北中郎将”卢植。派往豫州的，是‘左中郎将’皇甫嵩与‘右中郎将’朱儁。

卢植是刘备的老师，也是刘备的小同乡：生长在冀州涿郡。他以极少的兵，对张角的基本武力作战，竟然能把张角围困在今日河北省威县之东二十九里的汉朝广宗县城。灵帝派了一个姓左名丰的宦官来视察，卢植不向左丰送钱，左丰回去报告灵帝，说卢植有力量消灭张角而不肯卖力。灵帝就下了一道圣旨，把卢植逮捕，用槛车(囚笼)押解洛阳，派‘东中郎将’董卓来带卢植的兵。

皇甫嵩出生在民风强悍的边地凉州安定郡朝那县（朝那县城的地点，在今日甘肃平凉县的西北）。他的曾祖皇甫稜与叔父皇甫规，均为‘度辽将军’，可说是军人世家。他的祖父皇甫旗做过扶风都尉，父亲皇甫节做过雁门太守，他本人被推举为孝廉，做过中央政府郎中（相当于今日的司长），也做过霸陵与临汾的县令，被调回中央做‘议郎’（地位在今日的顾问与参议之间），转升为北地郡太守（北地郡包括宁夏的黄河两岸及甘肃的庆阳一带，东汉时的郡治，在灵武县东南）。这样看来，皇甫嵩似乎又是一位标准型的文官。

他留在历史上的令名，是一手平定了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他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位名将。汉朝的读书人，原是文武合一，不曾离开孔子所创下的射御与礼乐书数并重的教育传统。中国到了清朝中叶，仍然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几个文人，先后担任

统帅。只是到了民国初年，有了保定军校，文武才分了途。

皇甫嵩会同朱儁，把豫州颍川郡的黄巾打平。他于决战之日，用夜袭兼火攻。黄巾徒众本是乡下的种田人，过惯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白天精神抖擞，到了黑夜就酣睡如泥。皇甫嵩对他们实施夜袭，可说是看准了他们的弱点。皇甫嵩之所以用火攻，原因也很简单，他们的头目毫无知识，竟然“依草结营”。这河南禹县附近“长社”的一战，皇甫嵩杀了几万名黄巾。大头目波才率领残部逃往阳翟（禹县），被皇甫嵩追击，再度击溃。皇甫嵩附带扫荡了汝南郡与陈国（河南大康县一带），及东郁(山东濮阳县一带)的黄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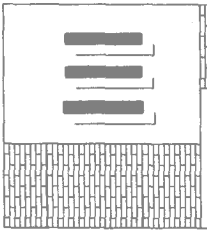
张角等人在冀州(河北省中部),于卢植被槛车召回以后,打败了卢植的继任人董卓。汉灵帝的朝廷，命令皇甫嵩去。皇甫嵩移兵向北，在广宗与张角的弟弟张梁决战，所用的方法又是夜袭。这一次,不在深夜,而在凌晨鸡鸣之时,张梁全军覆没,被杀了七万多人，投水而死的黄巾又有五万多人（张角这时候已经病死,皇甫嵩开棺剉尸,割下他的头,送往洛阳)。

张角的另一弟弟张宝,逃去了‘下曲阳’(今日河北省晋县之西）。皇甫嵩指挥巨鹿太守郭典，同往追击，捉住张宝，斩他的首。据范晔说，十几万黄巾徒众也同时被斩首，合埋在下曲阳的城南,造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坟(京观)。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会觉得皇甫嵩不该杀人如此之多。汉朝以及迄于清朝的各个朝代的法律，有关“造反”的刑法一向是很严酷的（后来，黄巾在中平五年再起，曹操在青州，即山东北部，打败他们，不杀而加以收编。这是曹操比皇甫嵩高明之处）。

皇甫嵩立了大功,被拜为‘左车骑将军’,领冀州牧,封为槐里侯，食邑八千户。不久，由于在凉州造反的边章与韩遂等人，进兵威胁长安一带的“三辅”之地，朝廷把皇甫嵩从冀州调回迎

敌,大宦官(中常侍)张让向他要五千万钱,皇甫嵩不给。张让在灵帝面前，告皇甫嵩一状，说他打黄巾无功，又浪费了公款。灵帝立刻收回了皇甫嵩的“左车骑将军”的印绶，削减食邑六千户，改封为‘都乡侯”。



董　卓

董卓是凉州临洮郡人,与皇甫嵩是大同乡 但出生在豫州颍川郡轮氏县；父亲在该地当县尉，主管境内的治安与兵役。

董卓生下不久,便被父亲带回凉州,和羌人混在一起。那时候羌人已经占了凉州不少地方。董卓天性好斗，力气不小，会骑马,又会左右开弓,喜欢腰挂双弓。他能打仗,可以当小军官,而不是将帅的材料 读过兵法,却食而不化,不会运用。政治,他却颇为擅长 可惜也只是长于权谋,不明大道。

他发迹很早,在本州做过“兵马掾”,主管武器与马匹 在中央当过“羽林郎”(羽林营中的军官)。不久,他被派在中郎将张奂下面当“军司马”,对汉阳郡的羌人作战,立了微功,升为“郎中”,慢慢地又由郎中升为“西域戊己校尉”。

汉朝校尉的军阶不低，不是今日的校官尉官可比。校尉仅次于将军，而将军的人数极少。最高的一位校尉，是“司隶校尉”,所辖的地域是京城及其外围各郡,等于一个州,称为“司隶校尉部”。他的职权，很像是首都警备司令兼全省保安司令。

西域是新疆天山以南各地。“戊己校尉”没有“部”西域便是他的“部”。戊己两个字,很费解。原来,这两个字代表东西南北以外的地域(甲乙是东,丙丁是南,庚辛是西,壬癸是北)用在此处,意思是“带兵巡回各地,没有固定的辖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董卓在新疆住了不太久，便丢了官。他很有办法，很快就东山再起，作了并州刺史，又升为河东太守。刺史管一州，职位低，年俸只有（名义上的）六百石粮食。太守管一郡，地位高，权大，兼管民政军政，有权指挥本郡的都尉，年俸有（名义上的）二千石。

中平元年,黄巾造反,董卓被拜为‘东中郎将”,派到冀州作卢植的继任,打张角,被张角打败,又丢了官。

中平二年，凉州的造反者在边章、韩遂二人的率领之下，打进了陕西渭河流域;“三辅”(三辅,是汉朝的三个郡以长安为中心的京兆郡,长安之右的扶风郡,称为‘右扶风”,长安之左为冯翊郡,称为‘左冯翊”。扶风的中心是咸阳,冯翊的中心是大荔)。朝廷慌忙从冀州调皇甫嵩回来，也起用了董卓，任命董卓为“中郎将”,不再加一个“东”字。皇甫嵩与董卓这一次均不能胜过凉州叛军。朝廷改派张温来做主帅,拜张温为‘车骑将军”,不像对皇甫嵩那样,加一个“左”字。董卓又升了官,由‘中郎将”改为“破虏将军”,算是列入将军的一类了。

董卓打了败仗而仍能升官,可能是由于懂得‘政治”,懂得送礼的重要，懂得如何送，以及送给什么人。

张温在中平二年冬天，打了一个小胜仗，把边章、韩遂赶回榆中县域（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张温派一位部下——荡寇将军周慎，带三万兵去追击。周慎不听孙坚的话，被边章、韩遂打败，丢了辎重与车辆,狼狈撤退(孙坚当时是张温的‘参军事”,相当于今日的高级参谋。孙坚劝周慎以奇兵断边章、韩遂的粮道。周慎不听，只晓得以全力围攻榆中县城；自己的粮道反而被边章、韩遂断了)。

董卓与周慎的地位差不了多少，张温也给他三万兵，叫他去打先零种的羌人；他走到天水郡的望垣县，就被敌人围了，几乎

全军覆没；用了他的小聪明，伪装筑堰捕鱼，军队在堰的那一边渡过了河,逃走;“ 全师而还 ”;有功,受封为 鬻乡侯。

边章与韩遂在中平三年发生内讧。边章死于韩遂之手。韩遂而且杀了其他的同伙，如北宫伯玉和李文侯，兼领了这些人的部队。

韩遂带了十几万兵，围攻陇西郡的郡城（甘肃省临洮县东北）。陇西太守李相如，向韩遂投降，参加他的造反。他们共同杀死凉州刺史耿鄙 耿鄙的一位姓马名腾的‘ 司马 ”,也作了韩遂的同志。

为什么凉州有了如此声势浩大的反叛汉朝的武力呢？因为在洛阳的宦官及其在凉州的爪牙，激怒了北地郡的羌人与枹罕县、河关县的汉人。他们在中平元年冬天共同推戴了湟中郡的归化胡人北宫伯玉和李文侯为领袖，以声讨宦官为造反的借口（枹罕与河关两县均在甘肃西南部。湟中郡在青海省的东南部）。

马腾是马超的父亲。自从马腾入伙以后，凉州造反者的声势更加浩大。他们在中平五年围攻陈仓（陕西宝鸡）。朝廷升皇甫嵩为左将军,升董卓为前将军,带了很多兵来,才解了围。

董卓因此又再升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管钱的“ 少府 ”。董卓却嫌九卿的地位不够高，不肯来洛阳就职。朝廷就改派他为并州牧。州牧比刺史大，也比太守大；主管一州的军政民政，不像刺史只是刺探与监察郡以下的官吏而已。

朝廷叫他把部队交出来,统归皇甫嵩指挥。他不交 把部队带去了并州,驻在河东,待时而动。

朝廷中的大将军何进，不仅不惩办他，反而求他进兵洛阳。他带了三千兵赶来洛阳 剄达之日,何进已死。

何进是被宦官们杀死的。宦官之中的蹇硕，先被何进杀死。

这是又一次的宦官外戚之争，也是东汉的最后一次。

事情发生在灵帝死后不久。灵帝死在中平六年四月丙辰日，不曾来得及先立太子。比较大的一个儿子，是十四岁的皇子辩，为皇后何氏所生。另一个儿子，是九岁的皇子协，为王美人所生；王美人已死，这个皇子协是灵帝的母亲董太后抚养大的。

传说，灵帝将死之时，有意立皇子协，吩咐蹇硕执行他的遗命。蹇硕身体肥大，手握重兵，官居“上军校尉”，统辖了袁绍、曹操、冯芳等其他七个校尉。

蹇硕可能不曾受有如此的托孤之命；或是能力太差。灵帝死后的第三天，继位为皇帝的并非皇子协，而是何皇后的儿子皇子辩。皇子辩在历史上被称为“少帝”（他是东汉的第二个少帝。第一个少帝，是殇帝之后，安帝之前的一位）。

何皇后临朝称制，以皇太后的身份替少帝当家。她的哥哥何进，在中平元年三月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之时，已经受拜为大将军。现在，她叫何进以大将军的身份，与太傅袁隗“参录尚书事”。袁隗被加官为“后将军”，对何进很合作。

何进很快便把蹇硕逮捕，关在牢里，杀掉。次月，中平六年五月，何进又把灵帝的母舅，骠骑将军董重逮捕下狱，杀掉。六月，灵帝的母亲董太后，忽然又死。七月，何进把皇子协由渤海王降封为陈留王；并且向何太后建议，把所有的宦官都罢免了，改用郎官。何太后不肯，说：“我是一个年轻的寡妇，怎么好意思使唤衣冠楚楚的士人？”何进这才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下命令给董卓，叫董卓“假造反”，带兵来洛阳，吓唬何太后。

何进在八月戊辰日，进长乐宫，向妹妹何太后请旨。这一次，他不是要求罢免所有“常侍”，而是要求杀尽所有“常侍”。小宦官偷听到他们两人的谈话，报告了“中常侍”张让。张让与段珪率领几十个人，手拿兵器，于何进辞出长乐宫门之时，把何进

邀到尚书省的阁楼,责备何进忘恩负义。他们说“有一个时候，灵帝生何皇后的气，几乎把何皇后废掉，是我们十二常侍每人出了一千万钱献给灵帝,这才挽回了局面。”责备既罢,他们就把何进杀死于嘉德殿之前。

消息传出，何进的部下军官吴匡、张璋与虎贲中郎将袁术，砍了宫门，攻到尚书省附近。袁术而且烧了南宫。张让与段珪把何太后、少帝、陈留王都带了走。由南宫的复道(陆桥)走入北宫。卢植这时候已经当了尚书，手执一戈，站在阁楼前面的路上，仰头大骂段珪。段珪把何太后放了！何太后从阁楼之上跳下。

不久,中军校尉袁绍与河南尹何苗也带了兵来,在“朱雀阙”下面捉住了中常侍赵忠，砍去他的头。何苗的头，忽然也被吴匡叫人砍了。吴匡说：“何苗现在虽则是助攻宦官，却一向是袒护宦官，并且接受宦官贿赂的人。尽管他是何大将军的弟弟，何大将军可说是因他而死。我们要杀了他，为何大将军报仇。”

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旻,这时候也在场。董旻同意吴匡的话，便与吴匡合兵，攻杀了何苗。这位何苗死得不明不白。他是进宫为乃兄何进报仇的，却被别人认作是报仇的对象。

最热心于大杀宦官,不仅是为了替何进报仇,也是为了替窦武与陈蕃报仇的，是袁绍。何进之企图杀尽十二常侍，很受袁绍影响。袁术之反宦官，也是受了袁绍影响。袁术是袁绍的堂兄弟。

这一天,不仅是十二常侍为屠杀的对象,所有的大小宦官都被杀得几乎是一个不留。张让与段珪等人把少帝与陈留王带走,逃到黄河边上的一个渡口“小平津”,被尚书卢植追上,杀了几个，其余的都投河自杀。

少帝与陈留王由一位小官吴贡陪伴着,在黑夜中摸索,借着

萤火虫的光，走了几里，遇到老百姓的车子，搭乘，到达了雒舍镇，住了三天，在辛未日骑马到了北芒镇。

董卓是在戊辰日的晚上，到达洛阳城的西边的。他接到报告，少帝与陈留王已经住在北芒的民家，便亲自带兵到北芒，去迎他们回宫。

少帝见了董卓和他的军队，很怕，怕得哭了出来，这也难怪。董卓的兵，并非全是汉族的人，而夹有不少羌人与胡人，相貌很凶。陈留王(皇子协)年纪虽小,却一点也不怕,能回答董卓所问的话，清清楚楚，颇讨董卓喜欢。

董卓在辛未日，偕同少帝与陈留王回洛阳。这已经是大杀宦官以后的第三天了。董卓所做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叫吕布杀掉‘执金吾’丁原。‘执金吾’的职务是维持京都治安。

丁原有兵。这些兵，董卓接管了下来。董卓本只带来了三千名，全靠常常在深夜秘密离开洛阳，于第二天白天大张旗鼓入城，让老百姓与袁绍等人相信，又来了一批董卓的凉州兵。董卓得到了丁原的兵，实力增加不少。

董卓所做的次一件重要的事，是叫何太后与参录尚书事袁隗，免掉司空刘弘的官，以他自己为司空。

第三件重要的事：便是在九月癸酉日召集百僚开会，提议废掉少帝辩，立陈留王协为帝。

董卓在百僚大会的会场中说：我要依照伊尹、霍光的前例，废掉现在的暗弱的皇帝，改立陈留王。谁要是反对我的意见，我就军法从事。偏偏有卢植以区区尚书的身份，敢发言反对。卢植说：“伊尹之所以废掉太甲，因为太甲当了三年国王而始终糊里糊涂，霍光之所以废掉昌邑王，是因为昌邑王犯了一千项以上的罪过。当今的皇帝年纪轻，却不曾做过不合道德的事，不可以与太甲或昌邑王看成一类。”

董卓听了卢植的这一番话,大怒,宣布散会,准备把卢植抓下去杀。蔡邕与议郎彭卓二人,都劝董卓不可如此,他们说:"卢植是一位大儒,声望极高,倘若杀了他,会惊动全国的人。"董卓于是便仅仅免掉卢植的官。卢植也就离开洛阳,去了上谷郡作隐士。

第二天,甲戌日,董卓又召集百僚开大会,再度提议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他同时逼迫何太后颁下策书,说"皇帝在丧,无人子之心,威仪不类人君。今废为弘农王,立陈留王为帝"。这时候,太傅袁隗,已经被董卓派人说通,袁隗扶了少帝走下大殿,把少帝所佩带的皇帝玺缓解了下来,交给九岁的陈留王。袁隗随即又扶了陈留王上殿,就皇帝位。

在场的大小官吏,没有一人敢像昨天卢植那样,慷慨陈辞。《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为了此事曾经与董卓有过争论:董卓说:"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1]……袁绍说:"天下健者岂惟董公?"袁绍说完了这句话,便"横刀,长揖,径出"。

袁绍与董卓的争论,倘若有这回事,那是在第二次百僚大会以前。袁绍在争论了以后,当天便离开了洛阳,奔向冀州(河北)。

董卓很笨。吕思勉批评得好:为了替国家选一个好皇帝,董卓是可以原谅的,然而他无此权力,也无此声望;为了替自己篡位或揽权铺路,董卓那就不免是自找麻烦。一个糊涂的少帝,要比聪明的陈留王容易驾驭。董卓应该先把中央政府弄好;想废立,等待将来不迟。

东汉末年朝廷的大患,是宦官把持政权。董卓到达洛阳之时,宦官刚好已被杀尽。而且,外戚也完了。董卓如肯向好里做,是十分容易收效的。他似乎除了这件废立之事以外,也颇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